

汪晓云 著

一本



殊

《海山经》文化寻踪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汪晓云 著

一本
萬
殊

《海山经》文化寻踪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一本万殊：《海山经》文化寻踪

YIBENWANSHU: HAISHANJING WENHUA XUNZONG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本万殊：《海山经》文化寻踪 / 汪晓云著. —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10
ISBN 978-7-5598-1851-5

I. ①一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《山海经》—研究
IV. ①K928.6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 10830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

（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1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）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11 字数：250 千字

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6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汪晓云，女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、国学院教授。
著有《一“字”之差：“道”何以“道”》《一
“名”惊人：“昆仑”之“道”》《一“器”
之下：“翠玉白菜”何以为“镇国宝”》《一本
正“经”：隐秘的汉语圣经〈海山经〉》，以及
《从仪式到艺术：中西戏剧发生学》《神·鬼·
人：戏曲形象探源》等。



前 言	1
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的“圣经”	15
- “圣经”非“四书五经”，为古代学问文章之源	18
- “圣经”为道统、帝学	20
- “圣经”包罗万象	22
- “圣经”隐而不宣且被删改、曲解	23
- “圣经”被曲解，因王权政治禁“圣经”并改变 “圣经”本义	26
- “圣经”尚在且可复原	29
- “圣经”有托附，亦有伪托	31
- “圣经”可信但后人不信，可解却难解	40
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的“圣经”	47
- 语言文字与“圣经”	49
- 楹联匾额与“圣经”	56
- 石刻碑铭与“圣经”	61

- 绘画雕塑与“圣经”	64
- 建筑与“圣经”	66
- 寺庙与“圣经”	69
- 山水名胜与“圣经”	71
- 戏曲音乐与“圣经”	77
- 民俗宗教与“圣经”	78
- 器物与“圣经”	81
- 颜色与“圣经”	82
- 方术与“圣经”	83
- 数术与“圣经”	83
- 人物故事与“圣经”	86
- 经幢与“圣经”	99

第三章 中国古代“圣经”为《海山经》 157

- 《山海经》为《海山经》之副本、“四书五经”之源“一本正经”	160
- 《山海经》为帝学、道统	172
- 《山海经》包罗万象	173
- 《山海经》隐而不宣且被删改、曲解	174
- 《山海经》因帝王废弃被诬为怪诞不经	176
- 《山海经》尚在且可复原	177
- 《山海经》有托附，亦有伪托	180
- 《山海经》可信但后人不信、可解却难解	181

第四章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的《海山经》 187

- 以“海山”为名之《海山经》《海山集》等	191
- 地理与《水经》《海道经》《海游记》	205
- 图录与《海录》	213
- 神怪与《海游记》	223

- 小说与《海游记》《水石缘》 229
- 历史与《海录碎事》 251

第五章 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的《海山经》 269

- 语言文字与《海山经》 272
- 神话传说与《海山经》 273
- 楹联匾额与《海山经》 276
- 石刻碑铭与《海山经》 277
- 绘画与《海山经》 278
- 建筑与《海山经》 279
- 寺庙宫观与《海山经》 282
- 山水名胜与《海山经》 287
- 戏曲音乐与《海山经》 297
- 民间经书与《海山经》 298
- 器物与《海山经》 298
- 颜色与《海山经》 301
- 方术与《海山经》 302
- 数术与《海山经》 302
- 人物故事与《海山经》 303
- 经幢与《海山经》 308

后记 340

前言

一

想写这本书，已经有几个年头了。写完《一“字”之差》《一“名”惊人》《一“器”之下》《一本正“经”》后，脑海里的惊涛骇浪从未平息，还有太多东西需要澄清。《一本正“经”：隐秘的汉语圣经〈海山经〉》出版后，常常有人问我书名是不是写错了，为什么不是《山海经》而是《海山经》；更有甚者，一看到书名就皱起眉头——在我们的常识中只有《山海经》，若说成《海山经》则不是无知就是错误。同样，说到“圣经”，我们会想到基督教《圣经》，因为在我们的常识中，“圣经”即基督教《圣经》。殊不知，早在基督教《圣经》传入之前，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中“圣经”屡见不鲜。中国古代“圣经”究竟是什么经？与中国古代经学有什么关系？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反复出现“圣经”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对中国古代“圣经”一无所知却只知道基督教《圣经》？

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，“圣经”不明，则经学不明、中国传统文化不明。与“圣经”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古代文献典籍对“圣经”的论述中。分析古代文献典籍对“圣经”的论述即可发现，“圣经”并非“四书五经”，而是隐而不宣之“一本正经”，且被删改、曲解；“圣经”为古代学问文章之源，内容包罗万象，但根本为帝王之学；“圣经”隐而不宣且被删改、曲解的原因在于王权政治禁“圣经”；“圣经”尚在且可复原；“圣经”有托附，亦有伪托；“圣经”可信但后人不信，可解却难解。

古代文献典籍对“圣经”的论述笼统而含混、隐秘而晦涩，时断时续却贯穿中国古代之始终，其中否定的表述多于肯定的表述，言何经不是“圣经”多于何经是“圣经”，以至于最终无法断定“圣经”为何经。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梳理出“圣经”的基本脉络与内在意涵：“圣经”是口耳相传的民间经典，其内容为民在王之上、民为君立法。由于民间“圣经”对专制统治具有颠覆性，官方以巩固、加强专制统治的“圣经”取而代之，并对民间“圣经”进行删改、曲解，因而有“假正经”与“正经”。“一本正经”告诉我们，“正经”只有“一本”，那么，它到底是什么经呢？

说到中国古代“圣经”，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《易经》，然而，《周易·系辞》却明言“易之为书也不可远，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”。“典”为“经典”，“不可为典要”即非“圣经”。《礼记·经解》更言“易之失，贼也”。与“易之为书也不可远”相反，《山海经》却以“古”著称，《博物志》言“太古书今见存有《神农经》《山海经》”，并将《周易》置于《山海经》之后，似有意暗示《山海经》为“经”而《周易》

非“经”。郭璞《山海经传》所附刘秀《上山海经表》，称《山海经》“皆圣贤之遗事，古文之著明者也，其事质明有信”。为《山海经》作注作序者亦莫不言其古。清阮元言“上古天尚通，人神相杂，山泽未烈，非此书未由知”，联系《系辞》言《易》作于中古而非上古，阮元此说实亦暗言“圣经”非《周易》而为《山海经》。“皆圣贤之遗事，古文之著明”表明《山海经》之“古”实与“圣”相伴，《山海经》诸论亦多言其“圣”，如《吴越春秋》言“盖圣人所记”，杨慎《山海经补注》序言其为“圣王明牖俗之意也”，刘承幹《山海经地理今释》序言其为“圣作明述之巨编”……按《博物志》“圣人制作曰经”，因此，“圣人所记”“圣作明述之巨编”即“圣人之经”“圣经”。

进一步研读古代《山海经》诸注以及古人对《山海经》的论述则发现，《山海经》不仅为最古之书，亦为古代学问文章之源，其内容包罗万象，但其根本为帝王之学；《山海经》隐而不宣，古“圣”今“怪”，且被删改、曲解，其被删改、曲解的原因在于被帝王禁止且被帝王利用；《山海经》有托附，亦有伪托；《山海经》可信但后人不信，可解却难解。古代文献典籍对《山海经》的论述与对“圣经”的论述呈现出惊人的一致。

在古代文人笔下，《山海经》毁誉参半、将信将疑，呈现出外表为“怪诞不经”实际却为“一本正经”的古怪面目。古代学者在《山海经》上做足了文章，使《山海经》处处都显得有些“另类”以至于须对其“另当别论”。常人多信《史记》而疑《山海经》，加上古人对《山海经》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述，使《山海经》可信但后人不信、可解却难解。个中原因，乃因《山海经》实为“圣经”《海山经》的改头换面。

破解“圣经”与《山海经》的关节点在于“山”与“海”，郭璞言“非天下之至通，难与言山海之义”。“山”与“海”并非现代自然物理意义之“山”与“海”，而为“以气寓道”。“道”为帝王之道，是古代帝王获得统治权的依据，所谓“君有道则兴无道则亡”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”。古代帝王无道自称有道，使“道”“难道”。天人、大小、古今、圣王、王霸、内外、君子与小人、天理与人欲等，实皆言帝王无道自称有道，使“道”“难道”。“道”“难道”故“以气寓道”，以“阴阳之气”隐喻“天人之道”。¹“山”为“阳”“海”为“阴”，“山”寓“人道”，“海”寓“天道”。“山”“海”位置不同，其义不同：“山”在“海”前为“扶阳抑阴”，隐喻尊王权；相反，“海”在“山”前为“扶阴抑阳”，隐喻尊民权。严格意义上的“圣经”本为“海”在“山”之前，为《海山经》，尊“天道”；由于帝王无道自称有道导致“离经叛道”，“人道”取代“天道”，官方“圣经”取代民间“圣经”，其方式为以“阳”取代“阴”、“山”取代“海”、《山海经》取代《海山经》。

《海山经》从其出现之始就被禁止且被改头换面为《山海经》，因此论《山海经》即论《海山经》，《海山经》与《山海经》如影随形。《史记》言“不敢言”《山海经》，《汉书》将“海”隐藏而只言“山”，为《山经》，其实乃以“山”显“海”藏暗言《海山经》为“圣经”却“不敢言”，官方“圣经”取代民间“圣经”，《海山经》

1 参见汪晓云《一“字”之差：“道”何以“道”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。

被改头换面为《山海经》。《后汉书》中，《山海经》恢复了旧名，但“废”《山海经》的“上”却变为“赐”《山海经》的“帝”，表明帝王在以官方“圣经”取代民间“圣经”的同时“反其道而用之”。《山海经》中“五山经”之所以称“五藏山经”，正是为了暗示“山”显“海”藏。“易”有“三易”，“连山”“归藏”遗失亦暗示《海山经》与“山”相连、将“海”隐藏。《孔子家语》中《山海经》称“山书”，《论衡》中《山海经》称“山海之书”，《史记》“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”等，皆有意强调“山”取代“海”、《山海经》取代《海山经》、官方“圣经”取代民间“圣经”、“圣经”之“正本”《海山经》藏、副本以《山海经》为名。

以“山”与“海”为名的《山海经》作为集官方“圣经”与民间“圣经”于一体的经典，实为真正的“圣经”《海山经》之改头换面。这些与《山海经》相提并论的书，其实皆为真正的“圣经”“一本正经”《海山经》之托名。在“山”与“海”的位置变换中，隐藏着官方“圣经”与民间“圣经”争“圣经”，亦隐藏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争夺话语权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卫平对元王说：“河虽神贤，不如昆仑之山；江之源理，不如四海，而人尚夺取其宝，诸侯争之，兵革为起。”“江”“河”不如“山”“海”，尚且“人尚夺取其宝，诸侯争之，兵革为起”，“山”“海”当可以想见。

作为集官方“圣经”与民间“圣经”于一体的经典，《山海经》以“山”在“海”前、“山经”在“海经”前、“南山经”在“西山经”前，隐言“扶阳抑阴”、官方“圣经”取代民间“圣经”。如何由官方“圣经”《山海经》回归民间“圣经”《海山经》，并通过对《山海经》的解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，既能有效解释“圣经”又能保证自

身安全，就成为解释《山海经》、为《山海经》作注作图者的看家本领。如《山海经》本以“南山经”为首，《山海经地理今释》却从“西山经”开始，尽管序者声称是“原稿阙”“南山经”，但“南山经”缺了也就罢了，为什么在“五山经”最后的“中山经”“亦未完具”？显然，这只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托词，因为“南”“中”为“阳”隐喻“人道”，“西”为“阴”隐喻“天道”，故“自《西山经》以下，至于《荒经》，粲然大备、蔚成巨观”，也就是有意以“西山经”开头，与“荒经”相应，隐言《海山经》。

“山”与“海”实为中国古代“圣经”的话语原型，为在“以气寓道”基础上滋生的“道寓于器”，具有隐喻性与综合性特征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言“攻守之计亦莫切于海”，并言“海运”“海禁”“海道”“海防”，其实皆以“海”隐喻“天道”。

知“山”与“海”为“以器寓道”，则知《山海经》经文皆“以器寓道”，故《文史通义》言“地理则形家之言，专门立说，所谓道也；《汉志》所录《山海经》之属，附条别次，所谓器也”¹。知《山海经》为“以器寓道”，则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皆“以器寓道”，进而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实以“阴阳五行”“以气寓道”为密钥，以“气”隐喻“道”，使“气”转换为“器”，将抽象的形而上之道寓于具体的形而下之器。中国古代训诂学则须以“阴阳五行”“以气寓道”为转换器，将“器”还原为“气”、再由“气”还原为“道”，由具体的形而下之器抵达抽象的形而上之道。所谓考据与训诂，即据古考今，而非以今释古，因“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，由枝节而返根柢

1 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，第995页。

也难”¹。“阴阳五行”“以气寓道”正是训诂学由今义回溯古义的秘诀，《悟真篇》所谓“报言学道诸君子，不识阴阳莫乱为”“欲向人间留秘诀，未逢一个是知音”²。借助这一秘诀，中国古代“圣经”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之真相即迎刃而解，破译中国古代“圣经”与中国传统文化亦指日可待。

三

“圣”在古文中写作“聖”。《说文》云：“聖，通也，从耳，呈声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言“从耳者谓其耳顺”，并引《风俗通》“聖者声也，言闻声知情”与《周礼》“六德教万民”，言“凡一事精通亦谓之聖”。“聖”强调的“从耳”“闻声知情”，实即“口耳相传”。古代传统中的“口耳相传”与“书之竹帛”相对，“口耳相传”为语言，“书之竹帛”为文字，语言为民间话语表达方式，文字为官方话语表达方式。中国古代老百姓不识字，其实是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。“聖”字“口”“耳”在“王”之上，意味着“民”在“王”之上、民为君立法。与“聖”相关者为“圣人之道”与“圣人之经”，“圣人之道”即民在王之上、君无道则民反君，“圣人之经”即载“圣人之道”之“圣经”。“圣经”（聖經）是口耳相传的民间经典，其内容为民在王之上、民为君立法。“圣人之道”隐言权力，“圣人之经”显言知识，知识后面隐藏着权力，作为权力的“道”是古代帝王取得政

1 （清）阎若璩：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第66册，第475页。

2 （清）张伯端撰，王沐浅解：《悟真篇浅解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，第21页。

治合法性的依据。中国古代帝王为维护自身统治，无道自称有道、非“圣人之道”自称“圣人之道”，从而使“道”具有特殊的隐秘性与欺骗性。古代文献凡言“道”者皆暗言“道”被“盗”，故为“怨声载道”。文以载道，道源于经，“道”被“盗”，“经”亦被“盗”，此即“离经叛道”。中国古代帝王无道自称有道的同时，亦以官方“圣经”取代民间“圣经”。官方“圣经”实为“假正经”，民间“圣经”实为“正经”，“正经”为“一本正经”而非“四书五经”，“四书五经”源于“一本正经”，“四书”为《山海经》之四大部分“山经”“海外经”“海内经”“大荒经”，“五经”为“五藏山经”。《礼记》言“易之失，贼也”，即表明《周易》为“假正经”，“易”之为“变易”亦隐言其变“圣经”之义。

由于“圣经”对专制统治具有颠覆性，官方以巩固、加强专制统治的“圣经”取代民间具有颠覆、反叛性的“圣经”，对民间“圣经”进行删改、曲解，使其由不利于自身统治变成有利于自身统治。中国古代经学实为“假正经”与“正经”争经，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实皆为解释“圣经”为何经。因此，“圣经”是中国古代经学的起点。因为被禁止，“圣经”从头到尾都未曾以本原面目出现，而是一出现就被改头换面，揭示“圣经”的真相就成为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的原动力。官方“圣经”巩固、加强现实统治，以“圣经”作为立法之依据；民间“圣经”颠覆、反叛现实统治，亦以“圣经”作为立法之依据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言：“国无经，何以出令？令之不从，上之患也，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。”“国无经，何以出令”即言“令”出于“经”，“令”即“教”“法”，也就是“道”。官方“圣经”与民间“圣经”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，两者之间形成连续性的历史张力，这正是中国古代经学与

经典解释的内在生命力。

中国古代对“圣经”的言说一直在中国文化内部进行，是中国古代精英阶层与统治阶层进行论战与斗争的方式。官方“圣经”与民间“圣经”在政治倾向上相反，但在话语类型、意义结构上相同。民间“圣经”与官方“圣经”以同样的话语原型与叙事方式统一于被遮蔽并被曲解的《山海经》，民间“圣经”颠覆、反叛王权；官方“圣经”巩固、加强王权。中国传统文化以两种“圣经”的对立统一为主线展开，在对立统一中形成张力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驱动力。“圣经”与《山海经》，则是追踪中国古代“圣经”的明线与暗线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，即须回到“圣经”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，使难解却可解的“圣经”“真相大白”。

中国古代学问称“道问学”，亦称“天人之学”。以训诂学为传统的中国古代经典解释与中国古代“道问学”“天人之学”具有内在的统一性，也具有同样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。这个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正是“圣人之经”与“圣人之道”。训诂学表面上是解释文字与知识，实际上却是在阐述政治与权力。以琐碎、重复著称的考据与训诂并非纯粹的学术行为，而是个体参与社会历史的实践方式。作为“圣人之道”的载体，“圣经”寄寓着社会变革的期望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助“圣经”表达政治立场、参与社会政治与历史变革，试图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与政治制度，对“圣经”的表述是精英阶层表达个体理想、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途径。

关于知识与权力，中国古代早已有明晰的论述，知识与权力首先体现为“道”。《道学渊源录总序》言“道与权合”，“古昔盛时”“岂有一毫自私自利之见存乎其间哉”，明言“道”即“权”，

“古昔盛时”“道”为“公道”，隐言“今日衰时”“道”为“私道”，也就是帝王无道自称有道，故须“讨回公道”。“道”与“权”外，尚有“经”与“权”，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十年》言“权者反于经，然后有善者”，揭示王权以官方“圣经”反对民间“圣经”。从《史记》“不敢言”《山海经》到《文史通义》感慨“频遭目不识丁之流横加弹射”“反复辨正”“屡遭坎坷，不能忘情”“激昂申于孤愤”，考证经史在古代被视为畏途，这是因为考证经史实即论道言政。古代道问学之本质为以知识言说权力，为“经世之学”，既为“经世之业”，难免会有“涉世之文”，一不小心就会触犯统治权，因此，章学诚感慨“经世之业，不可以为涉世之文”。

以“圣经”为基点，中国古代精英阶层通过民间“圣经”寄托现实社会变革的乌托邦理想与期望，中国古代权力阶层则通过官方“圣经”巩固王权政治维护现实统治，官方“圣经”与民间“圣经”在政治倾向上对立，在意义结构上统一于“道”的形而上关怀，却通过各种形而下的“器”以隐喻的方式呈现，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之意义隐晦难解。“圣经”不仅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源头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现象的源头，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亦源于“圣经”且解释“圣经”。从《山海经传》说东方朔晓毕方之名、刘子政辨贰负之尸，到纪晓岚言乌鲁木齐山中的小人红柳娃就是《山海经》中的靖人¹，中国古代文人自古就在暗示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与“圣经”、《山海经》之渊源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产物，对知识的解释因而也是对历史的解释，是对知识所体现的意义结构与历史脉络的整体把握，

1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，第1122页。